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穆
涛

肉眼看文坛

DANGDAI MINGJIA SANWEN SUIBI XILIE

穆 涛

肉眼看文坛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江苏文艺出版社

肉眼看文坛

作 者：穆 涛

责任编辑：黄小初

责任校对：姜 文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mm 1/32 插页 2 印张 5.875

字数：11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8-6/I·1098

定 价：7.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在断裂的夹缝地带	1
——关于作家班现象的思考	
贾平凹肖像	32
乡下人贾平凹	41
艺术怎么可能与心灵无关	47
——关于贾平凹的画	
对贾平凹小说一种倾向的印象批评	51
生病	57
鬼话	61
测字	65
一种面貌：向贾平凹约稿记	70
关于贾平凹一篇序的事记	80
《平凹之路》序	84
文学过客	87
猴子尾巴长在前边了	91

从挖耳朵看文学批评	95
纪念一生中的一刻钟	99
有远见的手艺人：异想天开的史铁生	103
铁凝十二问	113
微观铁凝	118
真僧只说家常话	120
——与韩羽先生的一次会面	
实践的意义：我们这一阶段的散文	127
《美文》两岁笔记	132
说说陈染	141
纯粹的故事：何申的小说思路	146
在方英文处过夜	149
向方英文同志学习	153
看看胡玥	155
自然与忧郁——武华的散文	157
心中的灵光	165
刘玉峰小说的思考方式	167
——兼与西部作家对话	
微观诗人	174

在断裂的夹缝地带

——关于作家班现象的思考

一、开场白：夹缝中的文人

在古都西安的西郊边家村附近，几排出租的楼房建筑吸引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来自除台湾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而且年龄差距很大，有的刚满二十岁，可有的已届知天命之年，连接这三十年断桥的只有两个奇特而虚幻的汉字——文学。

这两个汉字使他们告别了妻子和家庭，离开工作岗位，奔波几千里聚到西部古城的这些两层建筑里，继续着“专业化”的文学梦。和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新盖的建筑物相比，他们是更新的“新鲜事物”。

一九八六年，中国武汉大学率先承办“作家班”，哨声才落，已有几十位创作正值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站到旗帜下面，中南部润泽的空气和高等学府温厚的风，几乎使他们中的每一位又一次进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期，

而且创作质量普遍实现了裂变式的突进。

人们沸腾了，在武大作家班开学以后的几个月里，陆续想插班的竟有上百人。这一信息传出后，西北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商妥，将鲁迅文学院短期作家培训班迁至西北大学，更名为西北大学作家班，学制两年，享受文学学士待遇，期满后学有成绩者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一九八七年西北大学第一届作家班正式开学，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作家班牌子相继高高地悬起，许多省的文学班也星星火火地烧了起来。“作家班”一时间伸展到大江南北，有位编辑夸张地说：“在大街上一伸手，都有可能拍到一位作家班学员的肩膀。”

一位很有声望的老作家称作家班是个“怪胎”，他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培养作家的“机器”而担忧，他疾呼有关部门过问一下，最好对“作家班现象”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少生优生为好。他使用了一个不太友好的比喻：这种现象犹如一个人感冒之后打出的一串喷嚏，唾沫星子满天飞，必须对症下药，尽快治愈它。

一下子理解作家班是很难的事情。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些学员狂热、躁动、非理性，最通常的理解是花几千块钱买一个带缎面的文凭。如果这样去想，似乎他们付出的代价又“过高”了，那些快五十岁的人带文凭回去还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还需要付出二至三年的时间，告别妻子儿子，过上单身汉的苦日子。我认识的许多人，放弃了单位里提升的机会，宁可不要工资，停薪留职，还有的干脆辞了职，双手捧着苦苦攒下的几千

块钱学费，来到了学校。

这种现象，有待于专家们作更深入的研究，在此，我只能模糊地这么判断：无论如何，这些绝不是虚度光阴的人。

这是一群夹缝中的文人，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就不会有这些人。中国的文学在那两次政治风浪中形成了一个突然性的断层，很多真正才华横溢、根基深厚学贯中西的作家陷进泥沼里去了，这是在沙地上成长起来的一群作家。目前中国作家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创作，而应该是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这些人迫切需要补给哲学、美学、史学，甚至还有文学的营养。这些人很难，他们的处境太尴尬了。

二、杂草丛生的麦田

a 五颜六色的脸

一九八五年之后的中国文坛，很接近京剧脸谱，那种厚厚的光彩油腻腻地画了满脸，纯浪漫的形式化的激情弥散开来，一切都在升温，小说、诗歌乃至戏剧、电影都不约而同地广开门路，或另辟新径，像大雨中响起的声嘶力竭的呼喊，雨点和声音沾在一起，使得栩栩如

生的不是人物而是背景。

整个文坛飘起了大雨，可没有人等着天晴。

据《绿风》诗刊粗略统计，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之中，就诞生各种文学组织几千个，有的组织仅有两个人，可是旗号很大，大旗举过几天兴致索然后，便卷起来或干脆扔掉，两个人也分道扬镳，又各自与另外的人合营，举起更大更鲜艳的旗帜。四川诗人孙建军一九八七年在青岛讲过一个笑话：一天，他走在成都的大街上，随便问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是诗人吗？”那厮立住脚严肃地说：“以前写过两首。”

随后，各种形式的文学大奖赛如大雨之前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地跑了出来，以高面额悬赏捉拿试图碰碰运气的人，但评选结果，大多又这样草草结尾：鉴于没有收到最上乘稿件，因此一等奖空缺。高面额的奖赏比水中的月亮更不可触摸。我的一位朋友三个月参赛六次，半年之后他沮丧地告诉我，“有两次获了鼓励奖。”但我知道参赛的都是同一组诗歌作品，因而写信安慰他，“一条长蚯蚓钓两条小鱼，挺合算的。”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成了两家快餐厅的经理，腰缠万贯，左脚用劲一踩，胯下冒着烟一下子跑出老远，其中有一家装璜质朴清雅，名之曰：诗人聚乐部。可见，灰确实比土热。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北京一座高层建筑十层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一直尊敬的诗人林莽给我朗读了他最新写就的诗句：

阳光需要温和下来

海需要沉下来
星空静憩于头顶
这时，你走过沉沉的夜之大地
把逝去和向往的组成情感的河流
一切都跃然于脑际
闪闪如夜空的星斗

——《星光》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夜里三点钟过后，我渐渐入睡的时候（那个夜晚我很疲倦），耳畔响起的那近乎梦呓的轻轻的京腔。

徒劳无功和紧张无目的的气氛需要时间沉淀下来，恰如五颜六色的脸需要清水冲洗之后，眉目之间才会爽朗起来。

b 隔靴搔痒

中国作家的信仰深深地隐于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真正地理解每一位作家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就是封建割据，其最高境界就是使我们的思考非常细致、非常艺术地缩进一个个坚硬的壳中。

大巧成拙，大智若愚，大音无声，大象无形，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核。绘画、壁雕求拙且愚，几滴墨传神，三两刀达意，乐流空灵，丝竹之调若隐若出。文人更是

情致中人，仙、酒、自然、梦，难解难分，超然脱俗，信驴由缰。

可是上千年来高壁上，院落里，从帝王到庶民，雕栏玉砌，大红大绿，从龙戏凤到年画，婚丧嫁娶，喜庆悲哀，更是紧锣密鼓，唢呐齐鸣。文人们或则红楼狎妓，或则草席冷衾，仕途受阻，纵情田园。古典文坛绝少有健康向上的形象。

由此可见，传统的核从某种角度讲被文人们自己从纵向上折断了，我们的艺术家离生活太远。毛泽东很头疼这一问题，他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当代文学家们意识到了这种断层，开始修补这座断桥，可是又险些在横向上折断了。

诗歌明显地碎了，无形的手在九层楼把一个硕大的罐子扔到了现代的水泥地上。诗歌消失了，只剩下了诗人，确切地讲是写诗的人：工业诗人（矿山诗人，钢铁诗人），乡土诗人，军旅诗人，新边塞诗人，校园诗人，生活诗人，探索诗人，爱情诗人……像自由市场，每人守着一摊，貌似公平地竞争。

诗人离生活（诗的对象）太近了，几乎摸到了“大象”的身上，腿、肚子、尾巴、长长的鼻子，每只手都在为自己小小的真实而激动。

我们的小说似乎还清醒，在八十年代结束之前，短短十年之内，便实现了两次拉锯般的热闹与繁荣。第一次是初期的实验小说热流，其二是中后期的寻根风气。这种沿坐标轴向截然相反的方向摸索的尝试构成了很有趣

的一幅画面：往前走不通了，返回去试试看。

有时候，我们只是在说话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要说什么，八十年代的小说是怀着形式上的实验激情上路的。起步的一开始就表现了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全新的姿态，崇尚技巧，崇尚形式，崇尚结构和语言，一副创造新小说的大模样。这一时期，欧洲和美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作家们怀着实验的冲动，几乎想让一切崩溃，让一切立即真相大白，不惜打碎一切旧的格局，但又无力建立一种新秩序。这种小说出自小说的恶果造成小说整体的支离破碎，智慧的碎片闪着星星点点的光泽。

一个人大发一通宏论后，思想几近枯竭，接下来必须改变谈话方式及谈话对象，以求依旧显得生机勃勃。《百年孤独》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突然在一夜之间开始了对逝去一切的热烈怀想，他们以退为进，向故事的源泉地进发，以图找到仙丹，来补充大脑中智慧的匮乏，他们东拉西扯，品头论足，又极尽自残自贱之能事。用草木皆兵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不算太过分，一枚古币甚至一块瓦片，在小说家们眼里都闪着金属的高尚和古陶器的神秘光辉，都隐匿着力量，都与主题息息相通。这一时期的小说更接近寓言或启示录，几乎连小说中的标点也在讲述道理，作家们以一种深沉的偏执绕到了自己的背后。

美国小说家巴斯在谈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文风时，有一段精彩的自责：“又一篇关于故事创作的故事！又一次无目的的倒退！有谁不更喜欢这样的艺术，它至少是公

开模仿某种不属于其自身过程的事物？并且频繁地声明：别忘了我是一件人工作品。”

说到底，“寻根小说”（这个概念是极不准确的），是继形式的厌倦之后对内容的又一次兴趣实验，这类小说有两块最明显的胎记：严肃但有限的才智和对语言糟粕的偏爱。这两次高潮训练了众多小说作家，但只产生了极少量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以来，诗人和小说家们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我们的胜利很有限，文学不能缩进一只精致的罐子里，也不能将罐子摔碎，更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混为一谈。用同一把刷子给每张脸做死板的标记。

我喜欢一部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我不想看你的嘴，在黑黑的夜里，我只想听你的声音，那是歌的本质。

c 文学学徒

“作家班是怎么回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美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克拉克·米切尔先生问。

“类似一种加工机器。”我想了好一会才说。

我开始时想使用文学学徒这个词，但考虑到过于简单，有敷衍之嫌，就铺开来解释了这部“加工机器”的背景。

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

第一次是七十年代上半叶由官方办的“小靳庄诗歌

运动”。开始的动机似乎很庄严，但效果却显得有点滑稽，那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糟糕的阶段。

再一次就是始于八十年代上半叶的“文学函授运动”。北京乃至各省的多家杂志期刊开设了各种文学形式的函授班，普及文学常识与文学创作，开始时并不正规，但效果却很难得，纯粹的诗歌小说观念像水浸入稻田一样浸入了青年们的心灵，许多人稻秧般被移插到文学新时期的水田里，在水的浸润下愉快而健康地成长了。

从某个角度讲，函授班是作家班的前身，或称之为雏形，归根结底，函授班还是一种“业余组织”，对那些立志于文学创作，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讲，它显得不太正规。这些人迫切需要暂停一下，或提高，或深入，或转换视角，在这种焦急的呼唤中，只有高等学府承担得起这份额外的压力，但文学和文化是两个概念，作家班是个新创的名词，作家们走进大学校园，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给水车贮满水，或给电池充足电，教授们也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些“学生”。

作家班学员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总体上讲，他们生活底子厚实，只是缺乏同样厚实艺术语言，说是补课也行，说是换一池清水泡泡也行。谈到作家班学员的基本创作情况，我在此引用湖北作家刘富道先生的一句话：像刚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又鲜又大，色泽宜人，只是毛还没有擦净。

在和克拉克·米切尔先生谈话的尾部，我才使用了文学学徒这个词，并且告诉那位美国学者：“类于你们的

格林威治村。”

“作家班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乡？”他最后问。

“就算什么都没有，希望还是有的。”我最后回答。

三 空中楼阁

d 营养不良症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他困难地操着普通话，他来自中国南部的一个县城。

“你们开过什么课？”我问。

“摄影、版式设计、印刷。”他答。

“印坏了呢？”我问。

“有消字灵。我们学过消字灵的使用。”他答。

这不是杜撰，我是在一所大学作家班招生办公室门外的草坪上见到他的。这所大学的招生条件是：大专以上学历，省作家协会会员，以及专著或相当分量的作品。他当即给我看了毕业证，当然是复印件，他的照片在有点发黑的纸上比较清楚地印着。

我不知道他报考的结果，但可以肯定不会考中。一盏灯点燃后，赶夜路的人走来的时候，蛾子也会飞过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条可以理解的是，作家班学员普

遍营养不良，这是这些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差距较大的作家班学员唯一共同之处，这也是他们到学府中来的唯一原因。

他们从各个角落走来。大多数早已成家婚配。山西《长治日报》副刊编辑王立敏在西北大学注册的时候，她的女儿十七岁，很多人几乎都是攥着心来上学的，咬紧牙重新过起了单身汉日子。

他们错过了太多的良辰，在读书的年龄没有书读，在思考的年龄没有想到或不敢思考，在不该上学的时候却做起了学生。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剧。

“深夜静对鬼子书，晨来背诵 ABC”。

这是河南作家苗纪道（《莽原》编辑）在他宿舍房门上写的一副对联——他颇形象地概括了作家班学员的这份缺憾。

月上中天，窗子关上之后，现代西方的创作理论及创作实践潮水一样漫上千渴的沙滩，时间太短暂了，这几乎是这些人一致的感觉。他们再次回到读大部头书的年龄，把一本本书摆在桌子上，一页一页系统地阅读自己。

英语几乎是所有作家班学员最头疼的东西，它像一片无望的水域，让这群根本没见过水的人从此走过去，纵使这片水域不宽也不急，但他们必须从 ABC 起步。

西北大学外语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李贵仓头疼地说：比教小孩子走路还难，他们的膝关节锈住了。在教作家班英语课之前，他一直带着“托福班”。

e 闲谈请勿超过十五分钟

我的一位朋友陈焕新去世了。在一九九〇年六月里一个炎热天的瞬间，甚至他的精神也永远地消逝了。他是西北大学作家研究生班学员，时年三十八岁，生前住在我的隔壁，与我仅有一墙之遥。他家住安徽阜阳市。那里最主要的一条大街也常常尘土飞扬。一九八六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里市政府招待所一间潮湿的房间里，我们一见面便很投缘，经常谈到很晚，两小瓶白酒加一点卤豆腐。以至于几天后离开那座小城时已经相当难解难分了。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西安，在西北大学十一舍四楼，我们成了很好的邻居，他总是在半夜一两点钟找我要烟。他敲门声音很特别，就像他走路的姿势一起一伏的，每次总是说同样的话：“又没了，明天多买两包。”

他的创作时间全部安排在晚上，从晚上八点钟开始，他就插紧了房门，开始守着一盏十二瓦的台灯拼命。那盏灯一直持续亮到凌晨三四点钟，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得背诵英语单词。到一九九〇年六月份，他终于拚掉了年轻的生命，留下无尽的凄凉和寂寞给他的妻子和十岁的女儿。九月份，处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巨大的痛苦使她显得憔悴和虚弱，她是职业演员，话剧的舞台垮了，现在只好“待业”，当房子显得空荡荡之后，苍白的墙上隐在英语单词卡片之间一张长方形的纸